

论产业结构调整の现期适应性与长期主动性

邹 薇

反思我国产业结构调整の历程,我们不能不为一些似乎悖谬の现象所困扰:为什么经历了40年发展,我国仍难确立主导产业和相应の产业发展与演进序列?为什么有些产业虽强调重点扶持,但“瓶颈”却始终又细又紧?为什么有的产业在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同时,却总摆脱不了市场短缺の阴影?为什么“六五”、“七五”计划中都把结构调整放在重要位置,去年国务院又制定了产业政策要点,而结果却难以如愿以偿,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反而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の严重障碍?总之,为什么我国の产业调整总是显露出为现实矛盾所追逐の困窘?严峻の现实矛盾迫切要求我们对产业结构の调整作出新的更深の认识。

笔者认为,产生上述矛盾の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处理好产业结构调整の现期适应性与长期主动性の关系。本文拟就此谈点粗浅の意见。

—

我以为,产业结构调整依照其目标与措施体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为现期适应性调整,二为长期主动性调整。所谓现期适应性调整,是指根据现实经济运行中暴露出の某些结构性制约因素,比如某种产业(产品)短缺或过剩,抑或短缺与滞存并存,干扰了正常の生产、流通秩序,而采取重点支持或抑制措施,促使各产业的发展速度、规模、比例和关联序列等与客观物质技术基础和现期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の一种产业结构调整对策。所谓长期主动性调整,是指根据经济、科技、社会发展の总体状况和未来趋势,确定带战略性の产业结构目标,并相应制定和贯彻一系列循序渐进の政策与措施,实现较长时期内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の一种产业结构调整对策。

这两种调整の出发点及其相应の措施是不同的。现期适应性调整从经济运行の静态现实出发,旨在谋求解决既存の供给与需求结构の比例失控问题,比较直观、直接地抓住一个或几个最为尖锐の供求矛盾,通过对产业发展重心の短期调节来改善供给结构,使之与需求结构相适应。相应地,采取の措施是一步到位,现实中有何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亦即削高填低,拉平补齐。而长期主动性调整从动态经济、社会发展の大局和长远规划出发,旨在谋求解决产业结构の滞后、僵化和转换能力失调の問題,根据各产业生产供给の效率水平和需求收入弹性等基准,主动地把握未来产业布局目标,双管齐下地实现供给与需求结构の彼此均衡。相应地,采取の措施是分阶段地推行的,相对超脱于现期矛盾之上,而作用于整个社会资源优化配置の深层,亦即保证基础,重点转移,强调效益,优胜劣汰。

两种调整预期の与实际の結果也各不相同。现期适应性调整预期实现现期中供给与需求

结构的平衡，注重结果的时效性与显著性，因而实际上往往以其急功近利的特征而牺牲了长期目标或引起既有结构矛盾在各个现期间交迭出现，甚至愈益累积深化。长期主动性调整预期循序渐进地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现代化，执著于远期目标，要求各个现期的具体措施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标，为此实际上可能形成对现期目标的制约乃至否定。

二

40年来，我国针对不同时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多次对产业结构进行较大调整。“一五”、“二五”时期，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一低二不平衡，特别是工业落后的状况，确定以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特别是钢铁、重型机械为中心的产业发展序列，目的是迅速奠定工业化的基础，并形成一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由于急于事功，片面强调钢产量指标的意义，“以钢为纲”的过度倾斜导致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结果60年代初期被迫进行结构调整，主要措施是抑制重工业脱离实际地增进，重点支持农业、轻工业，以解决“吃穿用”问题。随着消费品市场供求矛盾的逐步缓解，基础工业薄弱的矛盾又突出起来，加之60年代对战争危险估计失当，因此“三五”到“五五”时期，发展重心再次偏向重工业，特别是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投资额甚巨，却不能提供相应的有效社会供给和发挥产业连带作用，结果偏重的发展并未强化薄弱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而且重轻失调矛盾愈益激化，特别是消费品市场短缺严重。

1979年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针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尽如人意的状况，改变重工业片面突进格局，进行了以“轻工业六优先”原则为主要措施的结构调整，同时抑制重工业发展。“补偿性倾斜”发展与“还欠帐”性质的居民收入较大幅度的提高，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促进了轻工业迅速发展。到1981年，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产值比重达51.5%，1982年为50.2%，出现前所未有的轻、重工业比重逆转。然而一方面重工业中瓶颈部门逐渐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轻工业的一概“优先”，造成各地大上“短平快”项目，重复投资，盲目建厂，市场分割，产销不对路，以致轻工业产品出现结构性过剩，其中尤以纺织品为甚，结果在旧有结构矛盾上更添新的失衡。

1984年，由于不切国情地引入以“三高”刺激经济增长的观点，在高消费的指导思想下，消费基金膨胀，消费品生产盲目超前高档化，基建投资急剧增长，远远超出了钢材、木材、建材、能源等的供给能力。然而这次偏轻的高速度是以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进出口逆差和财政赤字上升支撑的，“瓶颈”制约的严峻形势并未得到应有重视，而主观地臆想以“高速效应”来解决各种经济问题，包括结构问题。结果事与愿违，在消费、投资猛涨与财政较大赤字情况下运行的过热经济，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保证和合理的产业比例关系，不仅自身难以继，而且导致供求结构性矛盾加剧，并诱发了通货膨胀。

为此，1985年第四季度开始抽紧银根，压低经济增长速度，抑制过热的消费需求，同时发展重心相应地再度转向重工业，反映在基建投资上，重工业投资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35.7%回升到40%以上。然而这次紧缩带有“一刀切”性质，并且历时过短便在投资饥饿、消费过旺的惯性压力下匆匆收场。在这个比较典型的“经济过热—需求过盛—供求紧张—经济紧缩—放松紧缩—经济过热”的循环中，结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改观，比如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与加工业的比例，1980—85年为1:1.6:2.4，到1986—87年成为1:4.1:4.4，短线仍短甚至更短。1986年以后反弹的经济增长，不仅消费膨胀继续在攀比、示范效应等作用下较前有过之

无不及，而且当时转而突出的生产性基建也致使投资膨胀势头更加不可遏止。长期滞后的基础工业再也负担不起双膨胀下的过热增长，而外汇耗竭，外贸条件恶化又使得进口填缺已不现实，因此主要物资的紧缺与抢购、囤积、倒卖等流通混乱现象互为助长；在消费资料领域也出现罕见的居民挤兑存款，盲目抢购风潮。应该说，这一次经济环境严重恶化，经济秩序极度紊乱的状况，不仅是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的总量失衡的结果，而且是经济结构矛盾长期累积，虽或强或弱时有显现却始终未得根治的一个总爆发。

为了迅速扭转经济失调局面，1988年底中央作出了关于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其目标之一是改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1989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当前产业政策要点”。近两年来虽然在加强农业和基础工业，控制加工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预期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失衡问题仍旧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国以往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属于现期适应性调整，而缺乏立足长远、目标明确、措施有效而又伸缩有度的长期主动性调整。由于只注重针对现期某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直接到位的“一刀切”、“一边倒”调整，于是，产业结构时常在各个现期性政策间跳跃，某一方面的合理化以另一方面的失衡为代价，引起产业之间、产业内部多层次的失衡和发展不稳定等问题。比如重心在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交迭，却始终捉襟见肘，呈现出局促被动，往复挤压型关系。同时某些产业政策，比如79年为缓解市场紧张而实行的“轻工业六优先”原则，现期性较显著，但这种短期的适应性调整很快随着时过境迁而丧失其合理性，反成为产业结构进化的障碍。而那些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则被一次又一次地再生产出来。缺乏立足长期、全局的主动性调整，正是我国产业结构屡调不济，困扰纠结的关键原因之一。

试以能源业为例。自“一五”以来，我国一直非常重视能源生产，现已成为世界上能源生产大国，但能源产业作为“瓶颈”长期以来却是产业结构矛盾中一个十分敏感而尖锐的问题。

为什么一方面一再强调重点扶持，大力增加能源产量，另一方面能源短缺状况却长年胶着不变？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究其缘由恐怕正在于我们对能源业发展采取的调整是现期适应性的，而不是长期主动性的。通常是把短缺单一归结为生产供给不足，相应地单纯依靠追加投资来增加产量，然而置身于各行业投资与增长速度以及能源消费量增长的追逐战中，能源业与其它产业间的差距非但无法缩小，反有拉大之势。如1980—88年，能源生产总量累计增长50.3%，而同期能源消费总量增长52.6%，即使以能源生产增长量全部用于现期消费尚不敷需求，更不用说填补长期遗留下来的供求沟壑了。可见，正因为没有立足长期主动性调整，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上做文章，而仅从填平现存缺口出发，单纯靠追加投资增加能源产量的现期调整，难以发挥强化薄弱产业的预期效应，产量增长与浪费加剧殊途同归地从量上再生产与固化了短缺滞后的格局。

事实上，大力开展能源节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下表列举了一些国家能源利用效益的比较。

由表可见，我国能源利用率不仅与发达国家悬殊达6—10倍之巨，即使与就经济基础、工业化程度言同我国相当的国家如印度、巴西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如果我们改弦易辙，从长期主动性调整着眼，在适当增加能源产量的同时，把重点放在能源利用效率上，加速对现有

1985年各国能源利用效益比较

国 别	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①	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煤)	亿美元能源量
中 国	2603	77020	29.59
美 国	39440	227627	5.77
日 本	15799	44851	2.84
西 德	7479	34995	4.68
英 国	5080	27679	5.45
法 国	6073	21929	3.61
印 度	2001	19297	9.64
巴 西	1340	9377	7.00

①按1985年汇率折算

资料来源：根据《1988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工业的技术改造与更新，这不仅有利于能源业自身的供求平衡，而且有利于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整个产业结构层次高级化和经济增长。从上表可以推算出来，即使我国能源利用率达到印度的水平，不需增加能源产量就可使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半，若达到巴西的水平即可翻两番，至于按发达国家的水平类比，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潜力就更大了。

实现如上长期调整目标是否仅是主观愿望呢？不然，国际产业发展中不乏先例与实证。日本能耗量为其本国能源生产量的9倍以上，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度极高，但1973年石油危机中，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能耗系数由1.55—1.2降到0.371，有效地消化了石油涨价的冲击，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产业重心由重化工业向高技术新兴产业跃迁。美国能耗总量高踞世界首位，但据美国联邦能源部信息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虽然近十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保持在2.5%上下，能源消费量却没有增加，如以一美元产值计算，1985年能耗甚至比1972年下降25%，维持能耗总水平与经济增长并行不悖。因此，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推动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调整，是可以达到长期调整目标的。当然，这种调整构想的付诸实施远非一日之功，也难短期见效，但它把握了能源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方向，从而避免了调整中“复制失衡”的恶性循环。

从对能源业的现期适应性调整中可窥见一斑，“现期性”决定了这种调整具有攻击一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孤立性和后发被动性的致命弱点。结构性矛盾的形成与暴露都是一个动态发生过程，现期最为突出的矛盾也是多种原因复合作用的结果，单纯解决现存矛盾，有可能反而掩盖了经济结构中更深层次的矛盾（比如以增加产量缓解能源供求缺口就或多或少掩盖了生产与消费中效率过低的矛盾），还可能由其近期功利性引发新的矛盾（比如投资的过度倾斜与攀比助长的投资总规模膨胀）。从长期看，为矛盾的累积和后续爆发埋下了种子。所以应尽力克服产业调整中的现期适应性倾向，而把着眼点转到立足解决长期、全局和深层矛盾的主动性调整上来。

当然，强调长期主动性调整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现期适应性政策就可以忽视乃至摒弃，实际上这两种调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首先，任何较长的经济发展期间总是可以分解为若干个现期延续而成的“流”，现期适应性调整虽是补缺性的被动调整，但作为对客观经济环境变化的灵活反应又是宏观调控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尤其在经济秩序出现严重紊乱时，更是如此。因为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是两大部类之间及各自内部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如果现期比例失当，那么补缺性调整也不失为一种维持经济正常运行的办法，否则就可能使经济陷入矛盾纠葛的丛林中而难以发展，严重时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的滞缓和经济环境的恶化，长期调整也无从争取到主动性。

其次，长期主动性调整的认识基点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原有产业结构失却稳定性，内在地要求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从根本上解决产业结构长期累积固化的矛盾，相应地转移产业重心。因此它作为为实现优化的产业结构模式而有序推进的规划与再构，主要是定性地确立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整体目标，而具体贯彻则要求运用多种计划方法定量地分解到各个发展现期中去。同时，所谓“长期”与“现期”也并非绝对的时间范畴，而是在动态延续中相对而言的，长期调整若置于更广更远的经济背景与发展环境中，也会呈现出一些现期性特征，因此需要随时间推移，结合国民经济中长期计划的编制，“滚动式”地加以修正，改进长期调整的目标和措施序列。

最后，长期调整具有主动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也由此带有相应的局限性。一则长期调整目标是人们主观活动的产物，而主观构想要与现期乃至未来的实际合拍，难度相当大；二则它的传导链索更长，机制更复杂，要求客观经济环境相对稳定、均衡，否则会出现政策“变形”。因此应结合现期调整，既把现期政策大致控制在长期主动性调整的阈限内，避免过大的偏离波动，又从各个现期最棘手的矛盾的解决中得到信息反馈，不断完善长期调整目标、手段和评价指标体系，更好地把握产业结构演进的主动权。

不论长期性还是现期性调整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机制与环境。尤其是我国现阶段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经济信息欠完备，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机制也还在探索中，经济结构问题涉及面广，不是单靠将调整重心由现期适应性转到长期主动性所能解决的，而应把结构调整纳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总体中，经济机制的健全是结构调整能够得心应手的必要前提条件。

总之，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新思路即是区分产业结构中的不同矛盾，立足全局，以长期主动性调整为主体，辅之以灵活的现期适应性调整，形成协调高效的产业结构调整体系，进而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的跃迁和优化。